

文化的力量：跨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与制度调整的机制分析

游天龙 梁兆哲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跨国企业家已成为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经贸网络的重要力量。本研究聚焦于义乌的跨国企业家群体，探讨他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在商业成功、政治认可和制度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对三位具有代表性跨国企业家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家的文化资本，特别是教育和跨文化技能，有助于其在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间的转化，进而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此研究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家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跨国企业家 文化资本 制度调整 义乌

①作者简介：

游天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研究、边境研究，邮箱：tyou0410@gmail.com。

梁兆哲，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The power of culture: the mechanisms between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cultur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to local governance

Tianlong YOU Zhaozhe L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reform era,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became a pivotal force in rapidl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network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 class in Yiwu, China, exploring how they leverage cultural capital for business success, political re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By meticulously unpacking the oral histories of three such entrepreneurs,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ir cultural capital, particularl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proficienc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s as a cataly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other forms of capital, such 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is, in turn, exert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This study offers fresh insight into China's trajectory toward modernization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play in driv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Cultur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Yiwu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经贸网络,而众多的跨国企业家(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流往来,并且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随着中国在入世后逐渐引领全球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探寻商机,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驰骋商海,其中不少人的经贸活动牵涉多国。

但针对这一群体的现有文献目前还是更多是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传统移居国经商的企业家群体的英文研究(Dabić et al, 2020; Drori et al, 2009)。虽然这些研究对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家着墨颇多,但却相对忽视了随着中国崛起而前往非传统移居国创业经商的中国商人。而在中文研究中,虽然出海的中国企业家所在的国家更加多元,但这个群体在中国学界整体受到关注较少,且更多集中于华侨华人研究和海外民族志研究等少数领域(林胜等, 2017; 任娜、刘宏, 2019)。而且,已有文献中出海中国企业家研究和赴华外国企业家研究相互独立、对话较少,未能将两者有效联系以综合分析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陈宇鹏, 2018; 牛冬, 2015; 王炳钰、卢燕璇, 2021; 许涛, 2011)。

在对国内外企业家创业经商研究的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商业管理学创业研究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侧重企业家们的个人品质、经营策略、管理思路等要素,更多是缺少普适性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不仅

对企业家的创业经营活动缺少更加深入的、更具有社会科学洞察力的研究探讨,也过于聚焦于他们在移居国的创业经营活动,对他们与祖国除侨汇之外的经济往来、对他们在祖国与移居国之间跨国经贸活动缺少足够的学术关切,因而未能全面审视这个群体对祖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且大多数现有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政策与市场环境更多是这些研究中相对静态的背景。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各方面制度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跨国企业家是如何克服旧制度的制约、如何推动新制度的建立,则一直有待探索。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切,本研究以义乌为场域分析跨国企业家群体对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义乌,不仅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外跨国企业家的重要舞台。但在对义乌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义乌如何利用外商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升级其实着墨不多。现有文献一方面过于突出各级政府和关键主官的作用,相对淡化了市场主体——企业家——尤其是跨国企业家的才能,以及他们对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参与、帮助乃至引领,因而进一步忽略了政府和商界通过互动、协商等一系列方式推动相关制度建设的过程(刘成斌,2014;甄志宏等,2016)。另一方面,虽然义乌的外国企业家群体得到了学界的较多关注,但却更多将其视为社会治理对象,研究这个群体的融入、适应、互动和对他们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剥离了他们最基本的“企业家”属性,对他们如何在义乌和境外经商实践缺少充分了解(吕红艳、郭定平,2019;许涛,2018;吴瑞君等,2022)。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义乌本地企业家、来义乌经商的外地企业家中的许多人也有着国内外经商创业的丰富经验,不乏后来

入籍别国但依旧在义乌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海外华商，但这个群体在学界却鲜有人问津，未能对他们丰富的生命历程进行学理性的梳理分析。因此，对义乌中外企业家的进一步分析也能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建设的历程和机制的认识，以及对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有更丰富的理解。

本研究在众多受访企业家中选取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结合义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以口述史的方式完整地掌握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并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结合他们同时嵌入多国跨文化场域中的具体创业经营实践，深入分析他们如何利用文化资本实现事业成功，得到政治身份，并进一步推动义乌的营商环境等制度层面的发展。通过这三位在义跨国企业家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从微观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程。

二、文献综述

（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家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跨国企业家”这一群体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Portes et al, 2002; Kuchi, 2005）。所谓的“跨国企业家”，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创意、信息、实践和人脉，不停地在物理与虚拟空间中穿梭于多国之间，寻求企业发展机遇的行动者（Drori et al, 2009）。

在这个由跨国商业活动所编织的场域中，跨国企业家们必须同时与原籍国、移居国乃至第三国同时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游天龙、周敏，

2022)。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和适应各国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实践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克服了这些可能对其跨国商业活动产生制约的制度性障碍,并最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策略,利用跨国贸易的信息差优势实现了企业的发展(Vertovec, 2004; Yeung, 2002)。

因为跨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性制约更多、更大、更具有挑战性,所以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个人能动性,从自身或集体的理念和利益出发,尝试去调整、转变、乃至创造规章、制度和程序,打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Déjean et al, 2004; Drori et al, 2009)。而相比于从发达国家来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家,从发展中国家来到发达国家、或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的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各类资本较为有限。不仅他们的原籍国极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经济制度缺陷,而他们在移居国也难享受对企业利好的制度环境(Anderson & Ronteau, 2017; Riddle, 2008)。因此,这类跨国企业家往往会尝试改进其商业版图所涉及国家的相关制度。

虽然已有文献不乏有关跨国企业家推动制度调整的描述性案例,但却甚少研究将制度调整的结果与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各类资本相关联,对其具体的运作机制语焉不详。跨国企业家更像是制度调整背景下的客体,两者关系依旧置于黑箱之中。而中国研究的文献则突出跨国企业家在其他国家的作为,他们对中国的制度贡献则被大大淡化。

(二) 跨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

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跨国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发展和制度建设的时候

所动用的各类资源，比如象征资本、物质资源、专业知识、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Davidsson & Honig, 2003），而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文化”也日渐为研究者所关注（Dana et al, 2020; Paul & Shrivatava, 2016; Urbano et al, 2011）。已有研究指出，拥抱了世界主义文化观的跨国企业家，不论其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在原籍国和移居国所占据的社会地位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独特的文化优势（Nicolopoulou et al, 2016）。这不仅提升了他们在商业谈判中的主导权，还能使其能更好地识别、把握和利用商业机遇，最终在各个方面重塑了跨国企业家们的经营行为和日常生活（Chand & Ghorbani, 2011; Foreman-Peck & Zhou, 2013）。

但已有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将其视为可供跨国企业家选择的一些相对静态的、固定的文化编码和行为模式，而非一种可扩展、可修改的、且可以将其规则适用于全新情景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有研究中的“文化”更多是自上而下地将其理解为跨国企业家所处的社会情境和制度的组成部分，或者如诺斯（1992）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会极大地影响跨国企业家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理念。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情境和制度环境下的文化边界早就因为跨国企业家们的商业实践变得模糊和流动，因此需要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以经商实践为导向来分析他们如何将其掌握的文化资源与复杂而动态的企业经营行为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化资源是如何通过跨国企业家的经营行为影响和改变了当地营商环境（Drori & Lerner, 2002; Pütz, 2003）。

而跨国资本家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包括教育、知识、才智、技术、思维和其他可以进行跨国境转移和转化的文化体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

通过教育履历等方式制度化，成为一种跨国文化资本（Bagwell, 2015; Lloyd, 2019; Ren & Liu, 2018）。已有的研究指出（Drori et al, 2009），这种独特的资本不仅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等其他类型的资本，还提供了单纯依靠经济资本也无法获得的一些商业机遇，让跨国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设定议题、影响潮流、主导舆论乃至重塑文化和社会规范。

而文化资本也是跨国企业家用于制度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跨国企业家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教育让他们可以识别并利用现有的制度结构推动改变，在主张制度调整的时候更具有可信度和权威性，且能更清楚地向其他人阐述自己的愿景并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即使某些跨国企业家没有有意识地推动改变，他们日常的跨国经营活动本身就会影响乃至冲击既有制度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并为既有制度带来新的行事和思考的方式，为最终的改变积累势能（Baltar & Icart, 2013; Upadhy, 2004）。

但这一类研究过于突出了文化资本对跨国企业家的作用，忽视了他们同时动用多类资本实现商业目的的现实。这种割裂也导致了现有文献未能深入探讨文化资本与其他类型资本转化的机制，以及多种资本同时运用的具体情况。因而，当论及跨国企业家制度贡献的时候，现有研究就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三）实践理论视域下的跨国企业家研究

一直以来，商业管理研究就被批评过于理论化、抽象化、碎片化，且和具体的创业经营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商业管理一般被视为个体层面或组织层面的现象，相关研究也因此集中于个体层面的行为、情绪、

意图和思考 (Sarason et al, 2010; Welter & Gartner, 2016), 或是组织层面的战略、风险、导向和管理 (Golsorkhi et al, 2010; Nicolini, 2011; Raelin, 2016), 但却忽视了创业经营者从事的具体工作, 比如发现机遇、创造价值等等。因此, 受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启发, 越来越多的商业管理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点从企业家本人转移到企业家的日常行为本身 (Claire et al, 2020; Watson, 2013)。因为实践理论将企业家的日常行为与他们所互动的社会结构相联系, 所以该理论很自然地被用于跨国企业家研究, 让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审视他们的创业经营活动 (Drori et al, 2009)。

(四) 构建“文化资本—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

根据已有文献, 商业实践并不限于经商活动本身, 而指的是由多个创业实践者采用的、且深植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整套意义创造、身份塑造、秩序生成的行为 (Thompson et al, 2020)。基于实践理论这一行动导向的分析视角, 本研究将创业经营的商业“实践”视为一个受到“惯习”和“场域”这两个互补的概念所塑造的过程 (Terjesen & Elam, 2009), 并结合文化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跨国企业家推动制度调整的分析模型。

现有研究认为, “惯习”是跨国企业家在并行嵌入多国社会情境中所体现的“个体与集体的经验、观念, 和为其行为提供规范的”, 反映了他们接受、传播和改进制度的能力; “场域”则被定义为两个乃至多个宏观环境所构成的、存在潜在观念和现实冲突的、面临跨国企业家改造乃至挑战的一整套制度架构, 由市场环境、文化习俗、监管体系、

社交网络、权力关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 (Terjesen & Elam, 2009)。本研究进一步指出, 跨国企业家的惯习需要通过他们对多种资本综合运用而落到具体的商业实践, 从而在跨国性场域中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 并逐渐汇聚变革的力量。

而基于我们的调研发现, 因为制度调整本身的专业性门槛较高, 所以跨国企业家所具备的制度调整能力本质上受到他们文化资本的多寡所影响。他们先是利用文化资本发现商业机遇, 实现个人经济成就, 从而转化为较高的经济资本; 再结合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 得到各级政府的政治认可, 获得一定政治资本; 再综合运用三类资本, 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 实现制度层面有利于其企业发展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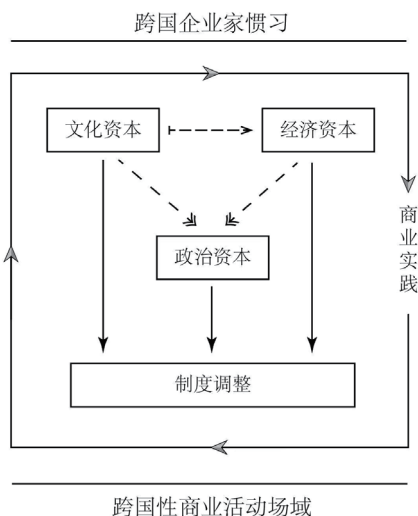


图 1 跨国企业家文化资本与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社会学的口述史方法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而改革开放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一章，是一次“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习近平，2018）。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深刻改变了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澎湃的发展动力和丰厚的物质基础。^①

但相比于这一段壮阔历史的伟大意义，社会科学界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市场经济萌发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且很快陷入碎片化境地。改革开放早期，不少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国成功转型的经验中总结规律，提出“市场转型论”（Nee & Matthews, 1996）、“地方发展型政府”（Bateman, 2017）、“县域竞争”（张五常，2017）、“国家资本主义”（Naughton & Tsai, 2015）等解释；之后的学者则更加专注具体行业，比如 Tsai (2004) 和 Shih (2008) 对金融业的分析等。而在学术界之外，也有许多改革开放政策亲历者的自传和传记面世，各地总结的官方叙事也屡见不鲜，一些成功企业也出版了不少自己公司的发展史。但遗憾的是，这些林林总总的解释中有相当一部分拘泥于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只见树木不见林，

^①参见《故事，从大讨论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历程》，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忽视了微观层面数量庞大的市场参与个体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而关注特定产业的部分研究的解释缺少足够的普遍性。而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动能来源不一，也让早期的理论很快失去了足够的解释力。而琳琅满目的各种史料，虽然极其珍贵，但更像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英雄谱，远不能反映这一巨大社会变迁的全貌。

而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的口述史则可以将曾经被忽视的跨国企业家——也即是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以叙事主体的身份带回我们的视野，使得已有的宏大叙事得到了具体经验的具体补充（周晓虹，2021a；周晓虹，2021b）。而通过观察跨国企业家们如何在讲述中表述自我、唤起记忆和展演他们的生活史，作者可以有效地将口述史作为一种理解个体与集体、主体性与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从他们的个体经验、宏大历史和当下情境的对话中去理解他们（周海燕，2021）。而因为他们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他们的叙事必然牵涉他人、关系和权力，我们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在他们所呈现出的集体记忆中找到对这个群体和他们行为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最终还原他们在跨国经营活动中所身处的社会结构以及所表征的国家与社会的时代意向（胡洁，2022；刘亚秋，2021）。更重要的是，通过口述史的方法，以及对改革开放时期开拓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们个人叙事的分析，我们会在学术上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重构其当下的价值与意义，获知当代中国的丰富想象，让个体经验进入“大写的历史”（胡洁，2021；周海燕，2021）。

（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16/content_5341207.htm）。

为了确保受访者回答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自 2021 年开始多次访谈三人，每次时间均超过两小时（王瑞芳，2021）。我们还应邀随同他们出入商会培训、政商活动、社交活动、纠纷调解等不同场合，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了解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如何运用他们的跨国文化资本。因为关系的深入，我们也得到了受访者更多的信任，在非正式交流中获悉了他们对各类事务更真实的看法。因为三位受访者在义乌商界都颇有声望，也让我们有机会从社区机构、监管部门等渠道侧面了解他们的具体商业实践。

（二）实践理论视域下的个案研究法

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复杂、多元的过程性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与企业家本人的行为高度相关，因此质性方法中的个案分析法被认为是这一领域最合适的研究方法（Davidsson, 2004; Yin, 1994）。而且个案研究法也天然地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契合，因为后者不仅是理论也是方法，可以有效地在不同案例中发现彼此的异同之处，从而发现个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不同分析层面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Bourdieu, 1998; Chia & Holt, 2008）。本文作者将过程追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相结合，从已有的 35 个跨国企业家访谈素材中筛选出理想案例（陈超、游宇，2022）。过程追踪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对机制的探索揭示因果关系的存在，而一般性分析法的优势在于能帮助研究者在不同解释之间进行甄别，因此将两个方法结合能有效提升个案研究内部效度。

通过两种方法相结合，“个案研究不仅能够提供深描式的叙述，还可以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证，从而为理论的积累与发展提供可能”（陈超、

游宇, 2022)。本文作者借助口述历史的方法采集跨国企业家的完整的创业经营历程, 实现“深描式的叙述”; 再通过设定相对严格的案例筛选标准, 实现“对关键部分的对比”(陈超、游宇, 2022)。因此, 根据跨国企业家的定义, 我们排除了国际旅行次数不多、跨国业务占比不高、与制度环境关联不深、在国外居住时间不长的受访者, 再将标准设为自营企业的主要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而为了检验文化资本对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 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受教育水平远超过其祖国和移居国平均水平的跨国企业家。而为了体现义乌在商贸领域所具备的跨地域包容性, 我们最后筛选出的三位跨国企业家中一位为拥有外国永居身份的义乌本地商人 A、一位为留学归国的中国外地商人 B、一位为来华留学后赴华创业的中东外籍商人 C。

四、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包含了个人基于其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所积累的知识、行为和技能, 企业家以此形成对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和社会价值的独特见解, 有助于在复杂的商业世界中发现商业机遇, 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和信任, 制订与目标受众的文化秉性相一致的经营策略, 从而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三位受访者均在八九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 其中两位还是留学生, 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难得。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000 年我国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尚不足 5 人。这意味着三位跨国企业家在学识、视野上均远超过同时代其他人, 具备极高的文化资本, 有能力在商业活动中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

（一）发现创业契机

文化资本，尤其是语言资本，有助于跨国企业家发现创业的契机。语言能力被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载体。有效地、有说服力地运用某种语言，能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有助于语言使用者获得职业上和事业上的尊重，使其跨越或维系其社会等级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就。

对三位受访者来说，语言都对他们的跨国经商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帮助。A 在九十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后下海经商。1997 年他偶然地帮助一位因语言不通而和宾馆前台发生争执的叙利亚商人，意外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成为了他的翻译。这位叙利亚商人当时给一位在沙特教育部工作的王室成员服务，在采购结束后邀请 A 前往沙特创业，使 A 成为义乌最早出海闯荡的那一批跨国企业家的一员。他很自然地认为语言优势为他赢得创业契机：

那个叙利亚老头……有语言障碍，他觉得在义乌需要一个义乌本地的人，他就向他老板，在沙特阿拉伯的老板汇报了，说在义乌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语言交流比较方便……我觉得出去也还可以，在语言方面又方便，所以一拍即合。

B 在 1998 年前往沙特国王大学留学，在校结识沙特政商要人，通过为他们处理对华经贸上的联络工作而积累了实务经验。他又是当时极少数在沙中国留学生，受邀帮助义乌商人拓展在沙业务，推销一款水晶香水瓶。在 B 顺利推销产品之后，他又受邀在毕业后合伙加入为其成立的新公司，顺利走上经商之路。

1990年C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留学,掌握熟练中文。毕业后C回母国工作数年,但又于2000年回上海从事外贸。之后C在深圳等多地辗转,最后在义乌落脚开创事业。而自身受益于语言优势,C要求自己子女都学好中文,其女儿还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汉语言专业,就连他的外甥也在其建议下转学到浙江工商大学学中文。

(二) 拓展社交网络

在许多职业领域,共同的文化兴趣、专业知识或教育背景是社交网络中个体间建立联系的基础;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让个体在社交场合更为得心应手;参与文化类社交活动的能力和兴趣为个人提供了扩展社交网络的机会;特定的文化资本可以增强个人对特定群体的认同感,使其更倾向于与群体内部成员建立联系。

比如,掌握某些语言的特定发音是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对跨国企业家拓展关系有极大助益。B曾分享一则轶事:

我去埃及主持节目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埃及文化部部长问我说是沙特的吗?我说我在沙特待过,他说听你沙特口音。实际上,埃及的阿拉伯语截然不同。在发音上,沙特更接近普通话,埃及相当于河南话……

具备双语能力、有着大学文凭的跨国企业家很容易从同行中脱颖而出,更受他人尊重。B就解释过高学历的社交价值:

我上国王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内政部长兼王储,当时给我们在毕业典礼上披上……黑金边的那种黑袍……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他们国家也比较受尊重,所以他们(沙特商人)天然地更相信我们一些。

掌握较高文化资本的跨国企业家们可以从异国生活经历中更深切地体验和解读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让他们在跨国商业活动中如鱼得水，拥有隐性竞争优势。A 在创业初期选择外国合作人的方式就折射出他对当地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沙特代表富裕的就是你家门口有几棵树……有钱浇树……很小的树，平均算起来要 5000 块钱，你条件好到哪种程度就是看你门口的树……

而避开对方的文化禁忌也是与外商社交中的重要一课，高学历、有丰富外国生活经历的跨国企业家更具文化敏感性：

我请了 105 个（外商）包机包来，全部是政府掏钱去把他们接过来入住酒店……我把沙特的老外带来会……赶快叫酒店……把那些……酒类……全部清理……因为他们是很忌讳的。

（三）企业发展战略

文化资本是跨国企业家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时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理解和利用文化资本，比如提供符合消费者的文化偏好的产品和服务、制定有文化共鸣力的品牌营销策略、在文化多样性的商业环境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等，企业家能提高战略成功可能性。

酷爱字画、对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 A 曾和我们分享过他的“文化生意经”，堪称利用文化资本的生动注脚：

所以说做销售、做生意不是你所理解的这种钱跟物的关系，是因为你给这个世界附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很简单的，今天一包纸，甚至上厕所的纸你都嫌这个纸太糙了……人家就在

这一包纸里面做成了过年烧香拜佛到上祖坟的时候，念一个经，什么《金刚经》都念起来，还要做成元宝一样的东西，你要花大价钱……为什么？你给了这张纸一种不同的属性，你赋予了宗教……所以我们做贸易的人、做品牌设计的人一定会抓住一种人文……都揉到产品里去。

而 B 的产品营销也受益于他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从一开始就规划品牌化战略，抓住中东北非目标市场的文化特征，给自家的香水命名为“古莱氏”。“古莱氏”是曾经统治麦加城的一支阿拉伯民族，穆罕默德与后世哈里发均为古莱氏族。该词从“格尔什”一词转化而来，原意为“钱币”，在阿语中意为“聚敛财富”。很快，B 的香水得到外国消费者的认可，在穆斯林世界和古驰、香奈儿等品牌齐名。

五、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这一概念多见于政治学研究，指个体或团体在政治领域内为影响决策、获得权力或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现有社会学研究对“政治资本”的认识较为模糊，布迪厄（Bourdieu, 1998）也仅仅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变种，也并没有讨论其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转化。部分中国研究者则另辟蹊径，将“政治资本”认为是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所拥有权力以某些方式具象化的产物，比如官方信贷、官方背书、官方身份等等，再根据一定标准将其赋予某些值得信赖的个体或团体（Ren & Liu, 2018）。本研究认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资本是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家获取政治资本的基础条件，而水平较高且具有个人特性的文化资本则会影响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资本的类型。

（一）以文化传播为核心的统战工作

相比于另两位，A 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颇深的跨国企业家，在出海闯荡之前曾多年收藏经营书画文玩，赴沙经商之后也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在义乌商界积累相当声望以后，政府希望他能发挥他在中华文化上的学识，在海外、在商界开展相关工作，因此邀请他担任中华文化海外促进会常务副主任。他曾介绍过他在这一领域的大致工作：

我们中华文化海外促进会就是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从商者发展起来，来传播我们的文化……我还是比较重量级的，我们蒋部长亲自在党校点名我……专门针对这一块，统一战线来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经常给侨眷人员授课……给留学生也上课……一定要讲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差异的东西，在差异当中找出一个公约数来。

A 也在统战部管理的世界义商总会担任秘书长，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当地文化的海外传播：

我们这里有一个义商总会跟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去对接……我的想法是为什么要到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去，道理就在那里，我们今天要把商贸业做起来，把义乌的这些东西做起来，离不开文化属性的东西。现在不仅是我卖的产品给到你，一定要有文化上的东西，比如我们义乌非物质的东西非常多，要把民间

的某一个手工业的东西也会纳到非物质文化里去，这就提高它的品牌意识，而且非物质的东西往往是要继承要传承的东西……就由浙江非物质文化把你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里面去……列为是非物质的时候，老百姓就会对这个东西关注，有了关注就会促进商贸业的发展，商贸业发展的背后有资本的支撑才能够留住发扬光大……把它拔高高度，关注到它，然后社会就对它认知，认知就会为认知买单，买单的背后就是利益，利益才会带动再往前走，因为它会有资本进入。

（二）以联络外商为核心的商界交往

B 因为曾经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国家沙特留学多年，所以在语言、文化上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按照他的话说：

能跟他们谈笑风生的不多，你们可能也学英语或者有些学阿语的，但是不能给他们开玩笑……但我可以跟他们聊让他们笑……

凭借这一优势，加上 B 的业务涉及地产、农业、医疗设备、高精制造、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已经担任义乌市政协委员的 B 经常受邀去和义乌的各国外商协会交流：

阿拉伯人在义乌比较松散，也门商会、叙利亚商会，约旦商会……名字叫商会，实际上政府没给他批……一些商人带头搞了个俱乐部论坛，叫阿拉伯商人论坛，等于联合商会……我经常一年给他们讲几次课，就讲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阿拉伯人不知道我们电商发展，他不知道我们 AI 在发展，我就跟他们一起讲讲。

（三）以外商治理为核心的调解机制

C 是某国商会会长，精通中英阿三种语言，在中国工作生活近 30 年，早就是义乌的一张老面孔了。因为他热心公益，而他居住的金城社区同样居住了数百位外籍商人和他们的家庭，因此负责金城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悦社工和当地派出所邀请他担任社区调解员，利用他的语言文化优势帮助社区调解中外居民之间的矛盾纷争。C 解释了他担任这个工作的优势：

我最初参与的调解工作大多数是因为双方因为信仰、风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误解，有一些误解光靠中国的朋友是无法解决的，他们可能不清楚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有些外国人觉得自己人在中国，中国人肯定帮中国人，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来调解也不理解和不接受，不容易达到调解效果。

而在义乌这个商贸城市，更常见的问题是跨国商业纠纷。因为义乌盛行赊账贸易，经常会遇到外国的不法商人骗钱骗货的情况，而我国法律缺少域外管辖权，追查这类商人的执法成本极大收效极低，很多时候中国商家只能哑巴吃黄连。而这时候，拥有海外社交网络的外籍商人正好有用武之地，C 也曾有帮助解决类似纠纷的经历：

那一次其实是双方之前沟通有理解偏差，那个叙利亚商人没有收到自己想要的规格款式，而中国商家认定对方收货不给钱。这个叙利亚人经常来义乌，不至于会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出面调解，大家事已至此，那边先处理积压货物，钱也马上给一部分，后来就没事了。

因为 C 为义乌做出的突出贡献，义乌市政府也授予他多项荣誉。不仅当地政府为他的人才绿卡申请背书，还邀请他参与旁听义乌的政协会议，并为他开辟专门渠道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

六、三种资本叠加推动制度调整

跨国企业家一向被认为是制度调整的催化剂。凭借在不同国家的商业实践经验，他们逐渐具备了理解和适应各种制度环境的能力。这让他们不仅成为连接不同制度的桥梁，还成为了把不同国家有相对优势的制度引进、扩散到其他国家的一股变革力量。在商业界，他们会积极推动新的商业模式、管理实践和技术创新；在政策界，他们会尝试调整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以便于商业活动的进行。而他们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的行为决策一样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变化。

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要推动制度层面的调整变化，跨国企业家需要综合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首先，只有具备足够经济资本的跨国资本家方能得到政府对其建言献策的重视；其次，只有具备足够文化资本的跨国企业家才能更清楚准确地把握政策导向且更有说服力地、有技巧性地表达自身诉求；最后，只有具备政治资本的跨国企业家才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和专门的制度性渠道去反映他们的诉求。

我们以 B 在 2023 年参与政策咨询的一个案例为例：

年初网红经济学家吴某有个帖子转得很厉害……他说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集装箱堆积成山等等，一季度外贸完蛋了，这是吴晓波的一个说法，那 4 月份又强势反弹，但按照他们那个理论

型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这边忽悠完了，讲不通了，那然后就要再给忽悠了。然后他们（指政府）就找我去，这副市长政协俩副主席来问，这个事儿是怎么弄，义乌是不是连着也跟着完了。我说你们不要听吴瞎掰，因为他不懂……马云说过一句话，你要听专家的，企业家听专家的，你肯定就把企业干死。因为专家是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企业家对未来的事情做预判，人家各司其职的，他说的这个现象是有，但是不能解读集装箱是比往年空置量堆积如山，增加了300%……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不看外贸，那么原因在2020年初因为疫情集装箱从原来的一千二三到一千八九美金，一下涨到了4万到美国；到中东国家，阿尔及利亚都2、3万美金，有些都超过了货值，你像地瓷砖一个集装箱也就4万人民币，然后过海运费能达到十几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4大集装箱生产企业像青岛哪里的就开始拼命的加装加点的做，然后做的集装箱都已经投入到使用中，这是其一。第二个是集装箱清关的周期，以前的时候（指疫情）……集装箱船不让你靠……原来的运输周期是40天的，现在能变成120天，你集装箱空着出去了回不来，周期变长了，现在一放开周期变短……都回来了。第三个原因，对方港口原来是因为疫情……对进口清不了关……现在正常了都……第四个就是所有的船东，因为它是商业行为，说我搞这个船我要预判哪个国家有货的，在中国一放开肯定会井喷式的增长，所以这个时候船东都把空集装箱运回来了。这4个原因就导致了集装箱空置率300%，这是个正常的商业现象，并不影响一季度的

贸易数据。我一季度就是一二月，这个是同比这个比去年是下降了0.1%，这个根本就没有下架，这是个正常行为……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B是如何综合运用三类资本来影响政策。首先，B自己从事外贸多年，有着广阔的商界社交网络，对外贸实务、业界动态、国内外局势了如指掌，所以才能比政府、比学界更敏锐地、更动态地了解市场趋势；其次，B在表述他的观点的时候逻辑非常清晰有条理，论据充分且有数据支持，对听者非常有说服力；第三，作为政协委员，B拥有一个具备高度合法性的政治身份，且有制度性的渠道和关系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和机构反映他掌握的情况，从而能一定程度影响当地政府对其所关切事务的决策判断。

但即使跨国企业家掌握并综合运用了这三类资本，也未必会导致制度调整的结果。B就有一些政策建议屡屡碰壁，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而如果说B作为中国人在推动制度调整方面有天然优势的话，以C为代表的外籍商人要推动制度调整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文化资本上的积累。他们只有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才能和本地人做到思维上的同频共振。C曾和我们讨论义乌的外籍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时说到：

我们之前反映了很多次……接触的主要是义乌市政府、外事办，这些事情我们会跟他们反映……有时候人大也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有时候他们也会想听听外国人有什么用的问题，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说……不管他们高不高兴都会说……有一些老外只会说政府喜欢听的，有些老外像我，我会说实话……

而后，C则从中某两国的历史友谊、古代中东和东亚帝国的包容性、

当今西方文化霸权对中东和中国的妖魔化等视角论证制度调整的合理性，并不时杂糅中医理论、一带一路战略乃至习总书记建党百年讲话等内容来贴近中国受众。作为某国商会会长、二十年跑了一万个货柜的C无疑是拥有极高的经济资本，在这番交流中他也展现了他在当地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为了推动政策调整所储备的文化资本以及他在表达诉求的时候所展现出的高超跨文化沟通能力。相信假以时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的一些合理建议将有机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采纳。

七、结论和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全球经贸网络中的中国色彩愈发鲜明。跨国企业家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案例中的三位企业家，凭借其文化资本优势在跨国商业活动中展现了极强的竞争力，为他们在义乌乃至更广阔的平台上驰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研究通过对义乌跨国企业家群体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如何利用文化资本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机制，进而从微观层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

本研究指出，跨国企业家利用其文化资本，在跨国商业活动中不仅捕捉机遇、建立信任，更是通过其独特的跨文化视野，推动了社交网络的拓展和经营策略的制定。在商业实践中，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将个人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而结合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在中国这一独特的经商环境中争取政府的政治认可。雄厚的经济资本是他们获得政治资本的基础，而不同企业家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则影响

了他们各自所获得的政治资本的类型。最终，通过三类资本的综合运用，跨国企业家获得了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的机会，帮助协同推动制度层面，尤其是营商环境的调整。

通过三位代表性跨国企业家的深度分析，可以看出，跨国企业家利用文化资本推动制度调整的过程是多维且复杂的。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活动和互动，不仅影响了个体与企业的发展，也对所涉国家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有其局限性，但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提供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

最后，本研究扭转了已有研究对跨国企业家群体在移居国创业经营活动的过分关注，更多地凸显了他们对祖籍国各方面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深入的探讨跨国企业家如何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运用其文化资本，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演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及其企业家的角色和贡献，对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陈超、游宇(2022). 迈向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 过程追踪与一致性分析的混合设计. 公共管理评论, 4(4), 132-148.
- 陈宇鹏(2018). 多元族群社会与互嵌型社会的构建——以义乌的实证研究为例.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13-118.
- 胡洁(2021). 个人叙事与集体记忆: 口述史的多维建构. 学术月刊, 53(11), 140-146.
- 胡洁(2022). 社会认同: 多维呈现与社会建构——基于贵州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 (1), 188-196.
- 林胜、赵姮、高哲(2017). 移民跨国创业的形成与困境.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1(2), 88-93.
- 刘成斌(2014). 活力释放与秩序规制——浙江义乌市场治理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 29(6), 197-220+245.
- 刘亚秋(2021). 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学习与探索, (7), 41-47.
- 吕红艳、郭定平(2019). 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 2019(9), 38-50+95.
- 牛冬(2015). “过客社团”: 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 社会学研究, 30(2), 124-148+244.
- 任娜、刘宏(2019). 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文化资本”结构、特征与作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4), 18-28.
- 王炳钰、卢燕璇(2021). 移民基础设施与南南流动: 在穗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与能动性实践. 广东社会科学, (2), 190-204.
- 王瑞芳(2021). 多轮访谈: 口述历史访谈的突出特征. 史学理论研究, (4), 142-147.

- 吴瑞君、吴潇、薛琪薪（2022）. 跨国移民的社会空间机制及移民治理启示——以浙江义乌的外国移民为考察对象.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4(3)，132-139+187.
- 习近平（2018年4月13日）.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第2版。
- 许涛（2011）. 在华非洲商人的双层叠加关系格局及其渗透与转化——广州地区非洲商人社会交往关系的再分析.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4)，10-15.
- 许涛（2018）. 外籍人士管理的创新与实践——基于义乌的经验.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3(4)，33-40.
- 游天龙，周敏（2022）. 并行嵌入：国际移民企业家研究的新理论模型. 世界民族，(3)，1-15.
- 张五常（2017）. 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二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
- 甄志宏、高柏、冯秋石（2016）. 政府建构还是市场建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 社会科学研究，(3)，107-114.
- 周海燕（2021）. 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6)，119-127.
- 周晓虹（2021a）.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社会科学研究，(5)，1-8.
- 周晓虹（2021b）. 主持人语：个体经验、集体记忆与中国想象.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6)，118.
- Anderson, A., & Ronteau, S. (2017). Towards an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practice; emerging idea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9(2), 110-120.
- Bagwell, S. (2015).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mongst Vietnamese businesses in Lond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2), 329-349.

- Baltar, F., & Icart, I. B. (2013). Entrepreneurial gain, cultural similarity and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Global Networks*, 13(2), 200-220.
- Bateman, M. (2017). Bringing the local state back into development: the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from the bottom-up. *Available at SSRN 3057226*.
-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London, U.K.: Polity Press.
- Chand, M., & Ghorbani, M. (2011). National culture, networks and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an 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6), 593-606.
- Chia, R., & Holt, R. (2008). On managerial knowledge. *Management Learning*, 39(2), 141-158.
- Claire, C., Lefebvre, V., & Ronteau, S. (2020). Entrepreneurship as practic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a nascent field.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3-4), 281-312.
- Dabić, M., Vlačić, B., Paul, J., Dana, L. P., Sahasranamam, S., & Glinka, B. (2020).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13, 25-38.
- Dana, L. P., Gurau, C., Light, I., & Muhammad, N. (2020). Family, community, and ethnic capital as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8(5), 1003-1029.
- Davidsson, P., & Honig, B. (2003).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3), 301-331.
- Davidsson, P. (2004).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Vol. 5). New York: Springer.

- Déjean, F., Gond, J. P., & Leca, B. (2004). Measuring the unmeasured: A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strategy in an emerging industry. *Human relations*, 57(6), 741-764.
- Drori, I., & Lerner, M. (2002). The dynamics of limited breaking out: The case of the Arab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in Israel.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4(2), 135-154.
- Drori, I., Honig, B., & Wright, M. (2009).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 emergent field of stud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5), 1001-1022.
- Foreman-Peck, J., & Zhou, P. (2013). The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of entrepreneurial cultur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3, 163-187.
- Golsorkhi, D., Rouleau, L., Seidl, D., & Vaara, E. (Eds.). (2010). *Cambridge handbook of strategy as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chi, T. (2005). IT Experience in India: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3(1), 147-148.
- Lloyd, W. (2019).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who' is motiva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Globalisation*, 23(1), 139-152.
- Naughton, B., & Tsai, K. S. (Eds.). (2015). *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mira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 V., & Matthews, R.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1), 401-435.
- Nicolini, D. (2011). Practice as the site of knowing: Insights from the field of telemedicine. *Organization science*, 22(3), 602-620.
- Nicolopoulou, K., Kakabadse, N. K., Nikolopoulos, K. P., Alcaraz, J. M.,

- & Sakellariou, K. (2016). Cosmopolitanism and transnational elite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Manifesting the cosmopolitan disposition in a cosmopolitan city. *Society and Business Review*, 11(3), 257-275.
- Paul, J., & Shrivatava, A. (2016). Do young manager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have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heory and deba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6), 1197-1210.
- Portes, A., Haller, W. J., & Guarnizo, L. E. (2002).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78-298.
- Pütz, R. (2003).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remarks on transculturality as practic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4(5), 554-563.
- Raelin, J. A. (Ed.). (2016). *Leadership-as-pract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Ren, N., & Liu, H. (2018). Domesticating ‘trans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diasporic technopreneur returne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5(13), 2308-2327.
- Riddle, L. (2008). Diasporas: Exploring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Journal of Microfinance/ESR Review*, 10(2), 6.
- Sarason, Y., Dillard, J. F., & Dean, T. (2010). 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 Reply to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structu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opportunity: A response using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Mole and Mole, 2008).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2), 238-243.
- Shih, V. C. (2008).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 (Vol. 5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rjesen, S., & Elam, A. (2009).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venture

-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A practice theory approa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5), 1093-1120.
- Thompson, N. A., Verduijn, K., & Gartner, W. B. (2020). Entrepreneurship-as-practice: Ground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ractice into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3-4), 247-256.
- Tsai, K. S. (2004). Off bala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fiscal feder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9(2), 1-26.
- Upadhyay, C. (2004). A new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Capital flows, business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the Indian software indust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5141-5151.
- Urbano, D., Toledano, N., & Ribeiro-Soriano, D. (2011).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multiple case study in Spain.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9(2), 119-134.
- Vertovec, S. (2004). *Trends and impacts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Oxford, U.K.: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
- Watson, T. J. (2013).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Euro-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radition: pragmatism, realism and looking beyond 'the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5(1-2), 16-33.
- Welter, F., & Gartner, W. B. (Eds.). (2016).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text*.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Yeung, H. W. C. (2002). Entrepreneurship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29-61.
- Yin, R. K. (1994). Discovering the future of the case study. Method in evaluation research. *Evaluation practice*, 15(3), 283-290.